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

◎ 邱海平

内容提要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经典著作,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须深入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和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要构建科学严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必须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体现出对《资本论》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资本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0-0039-06

DOI:10.15895/j.cnki.rwzz.2017.10.006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多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为主要依据,^①同时也受到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而对《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则体现得非常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实践和政策的内容,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已大不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但是,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和教材等成果来看,一方面还存在着“苏联范式”的明显痕迹;^②另一方面仍然未能充分体现出对于《资本论》的理论、方法和逻辑的继承和发展。要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

须深入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这里讨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 基金项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A170401)

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别代表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列宁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

②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仍然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出发点。根据马克思关于所有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从所有制出发理解生产关系和构建理论体系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8页。

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来源,因此,本文的讨论不涉及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一、《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因而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因而，认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的，这个认识和判断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据此认为，《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完全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对此，本文从多个角度来加以说明。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有机统一体，换句话说，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统一体。一般性反映的是事物的普遍统一性和本体性，个别性反映的是事物的个体差异性，而特殊性则是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统一，相对于一般性而言它具有个别性，相对于个别性而言它又具有一般性。就社会经济来说，它同样是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有机统一体。因此，研究和认识社会经济，不仅要认识它的个别性和特殊性，同时也要研究和认识它的一般性。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用社会经济的一般性代替或冒充社会经济的特殊性的错误和虚伪性，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社会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例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由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④因此，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毫无联系的，显然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从《资本论》的理论内容来看，《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资产阶级上层建

筑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不仅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过程，而且表现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可见，《资本论》还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因此，认为《资本论》仅仅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完全不适合于用来分析其他社会经济运动，是完全不能成立的。^⑤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特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四个层次和四个方面：第一，它同样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第二，它同样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第三，它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四，它以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和前提。可见，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规律，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还必须研究和认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资本论》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无疑是必须运用和借鉴的重要理论来源。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包含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而且即使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也都采取了资本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因此，《资本论》关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论同样对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第四，从《资本论》的方法论及其适用性来看：《资本论》中全面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观和方法论。列宁曾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1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说明了《资本论》的理论对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资本论》通过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并在其他各个具体理论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运用。因此,研究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动规律,更加需要继承和运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综上所述,认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而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搬照抄《资本论》。究竟如何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正是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目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从整个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一定研究目的的确立是影响理论形态的首要因素。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正确理解《资本论》的研究目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的辩证关系。例如,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经济学为了说明商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如何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实现尽可能多的贸易顺差的主张。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了说明产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如何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政策主张。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局限性,在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70-90年代,为了对抗和取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理论论证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创立了新古典理论。20世纪30年代,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进行宏观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斯大林为了

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理论。

由此可见,一定的理论形态总是由一定的研究目的决定的。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在科学的意义上提出相关经济学理论,但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无不打上时代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烙印,无不是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社会的现实需要服务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他公开承认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服务的,而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总是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的那种科学家,然而在事实上和本质上,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伪善性,都具有一种科学的伪装。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把1830年代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庸俗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价值和可借鉴的成分。当年马克思对于同样属于庸俗经济学家之列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曾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予部分的肯定,对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仍然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从《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关系来看,首先,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的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学。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当年马克思确立的理论任务与当前面临的理论任务是有历史性差别的。因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是指《资本论》在理论上的直接目的。而《资本论》的一个深层次目的,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进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供理论基础和武器。当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考察的是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但是在事实上,马克思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理解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现在看来,什么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否应该承认,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相比,仍然是不成熟的或者具有不成熟性。事实上,晚年的恩格斯也检讨过1840年代马克思和他对于形势估计的过于乐观。)然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成熟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有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充分。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像《资本论》那样,只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是应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今后改革的建设性意见和主张。

可见,就研究目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理论,二者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在揭示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面临的时代任务又存在着重大差别,《资本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政策服务和理论支持。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对策主张。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体现出科学性、实践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②

三、如何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辩证关系?

首先,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资本论》中将研究对象确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这也是《资本论》三大卷的理论体系布局和构建的核心。马克思还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④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⑤从表面上看,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说法好像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把英国只是作为一种“例证”,这就说明马克思并不仅仅只是研究了英国,他的理论也不仅仅来源于对英国实践的考察和总结。恩格斯强调了马克思对英国的集中研究在形成《资本论》理论中的首要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不知道或者否定马克思对其他国家情况的研究。事实上,马克思生前所做的研究恩格斯是非常了解的,而且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不久,恩格斯就开始整理马克思的遗稿,从而对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有了更加全面和具体的了解。从马克思发表的文献、遗留下来的笔记和手稿以及收集的资料来看,马克思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法国、德国、美国和俄国,而且还包括印度、中国等国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则是通过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

^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重要内容。

^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随着社会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同时,由于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同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不同,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根本任务和理论任务,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35页。



其政治经济学理论。

其次,这里还涉及马克思的方法和《资本论》的理论属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这就是说,《资本论》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叙述体系和逻辑体系,而不是历史体系,它是马克思长期研究之后的结果。《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范畴和理论按照辩证逻辑展开的过程,而不是马克思的研究过程。

再次,这里还涉及“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地认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而不是研究国别经济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是,在这样一种理解中,如果把国别经济研究与对于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割裂开来,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形态”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多地是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范畴”。在对大量国别经济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脱离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直接考察对象得到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是整个经济学理论史中的客观事实。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②恩格斯深刻地指明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和国别性,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研究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创作《资本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区分研究过程上的“对象”与叙述过程中的“对象”,具体来说,研究过程中的对象是各种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叙述过程中的对象则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及其规律。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说,没有对具体的个别和特殊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对于抽象的一般的认识,

没有对具体国家的经济运动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关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当然,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虽然面对的是具体国家的材料,但是,揭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它的出发点和目标,不能用国别经济研究代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事实上,对于国别经济的研究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也不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而只是国别经济史。因此,政治经济学与国别经济研究是一种辩证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范式”的深刻影响,普遍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从实践上来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具有了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理论上便不应该仍然沿用“苏联范式”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的独特之处则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正如前文所述,它是通过对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运动规律的,这体现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继承。

这里实际上涉及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如何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并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不发达国家,且表现为一个一个国家,而不是超越国家的现象。那么,现实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究竟如何对待具体的实践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实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制度。无论是列宁和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虽然对落后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在理论上并未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我们认为,必须科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表明,现实中落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若仍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过程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成并不断完善了许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并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而是应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对社会主义本身不同的理解及方法,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但更要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体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规范化的思维,以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侧重于分析社会主

义发展的问题,更多地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①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不能照抄或照搬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特殊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理论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这便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不仅要关注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还要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改革仍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所以,研究经济改革政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须,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不仅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而且提供建设性主张和政策建议。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出科学性(规律)、实践性(运行)、建设性(政策)的有机统一,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韩海燕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